

运城文史资料

第一辑

(总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运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运城考	李人序 (1)
运城学生运动简述	李人序 (5)
几位老干部关于	
《运城学生运动》的谈话摘要	唐梦楦 (32)
古村抗日红枪会访问记	李 林 (54)
抗战初期运安一带《红枪会》记事	席瑞卿 (58)
捣毁运城民声报社见闻	李 林 (63)
《河东书院记》碑文析疑	李人序 (66)
运城明德中学简记	介福平 (74)
关于运城涑水中学的回忆	王月竹 (78)
解县联师的成立及结局	刘龙光 (80)
张自安先生传略	李人序 (83)
阎锡山由严禁鸦片至大贩鸦片之经过	宋学璟 (93)
土皇帝谢克俭二、三事	李 会 (96)
荒年吃粥记	席瑞卿 (104)



李人序 整理

运城旧志有“运治建于池北之路村”，“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等字样。这就是说，古代并没有运城，只有个荒凉偏僻的小村庄——路村。后来因为管理运盐转卖才在这个村建立了城市。可见“运城”和“盐池”的关系非常密切。要考证“运城”必须由“盐池”谈起。

古代的盐公私都不占有，也无人管理，由老百姓随意取用。直至汉武帝刘彻，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实行均输，盐铁专卖，置大农丞管理其事，各郡国均设盐铁官。派出盐官二十八人，河东解盐为首，由黄霸充河东均输长（运城盐池的第一任管理长官）。后经魏、晋、南北朝时，都在河东设官司监督盐运，但职务名称屡有变更。隋统一后，对管理盐务收税稍为放松，禁令不行，仅设都水监护盐池，以防横水冲毁。现在的“姚暹渠”遗址，就是隋时的都水监姚暹修建的。唐时设置度支、盐铁、租庸、常平诸使。唐代宗时盐铁使刘晏为了整顿税收，增加财政收入，不时派遣榷盐使巡查。五代因之。宋代盐法屡有变更，在天圣年间特设“河东转运使提举制置解盐司”这个机构。在宋代以前，虽有管理盐务官员，大都附设于军、州、郡、邑行政机关，不是专门

独立机构。“转运使”的职务名称由这时才开始相沿下来。宋时清廉耿介的包拯，文学家欧阳修都担任过解盐“转运使”这个职务，对盐业转运调拨做了许多兴利除弊的好事。可是卖盐收税的事，仍由地方官解州知州兼管，故旧志载“知州兼两池榷盐事”。后经辽、金到元代，由于卖盐收税和管盐转运不是一个统一结构，争权夺利，互相扯皮，造成很多麻烦。旧志关于此事是这样记述的：“解州恃盐鹺之利，世为名郡，故曰丰宝军，亦曰兴宝军，曩者主盐之官与州有隙，遂置司于路村……”。实际情况如此，可是当时的表面文章是说，元太宗（此时元已占了山西）时朝廷命姚行简修理盐池。姚绘制了盐池的地形图及沿岸城镇村庄，并说明意见，经朝廷批准，才把“都转运盐使司”建于池北之路村。又令姚行简专管盐务。专管实际是兼管，不但管转运而且管专卖税收。解州知州不再管盐了，只派州判（副知州）驻司管理商民行政事务。到了延祐年间，因淫雨连绵，冲盐毁池，盐商破产，盐工失业，朝廷“减免引钞十之六七”，也就是减免了一部分盐税，于是商民感恩就把“路村”更名为“圣惠镇”。从此荒凉的农村变为繁荣的集镇了，但还没有高城深池。因此，后来有个转运使叫吴从仕的又把“转运使司”搬回到解州。到元末至正二十九年转运使那海德俊又迁“司”于“圣惠镇”，兴建城池，以保持官衙商户，并命名为“凤凰城”。后来由于“都转运盐使司”设在这里，几经辗转，就约定俗成的叫成了“运城”。“凤凰城”只成为历史名称罢了。

“运城”建城与盐有关，是不是产盐的地方都建有专

城？不是的。象我国淮、浙、长芦等地均产盐，盐场绵亘数百里，不是一州府县所独有，鞭长莫及，管理不便，只好由地方行政机关兼管，中央只能派巡查监督官员检查而已。我们河东是池盐，长约六七十里，宽仅十多里，不但筑有专城专司管理转运盐业，而且盐池筑有禁墙，保护产盐。可以说因转运盐而建城的只有河东运城。所以“运城”这个新名称往往成为“河东”的代名词了！清时兵备盐法道和民国的道尹公署以及后来的地区行政专员公署均设在这里，所以“运城”也就成为河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了。

运城之城池创建，始于元末至正二十九年（公元1369年）转运使那海德俊。初创时为一土城，有门五，城门楼四，一为便门，仅初具规模。迨至明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相继重修，塞其便门，城墙增高，但仍为土城。后于嘉靖二年、四年、十二年、十八年、二十年，共历时十八年（自公元1523年至公元1541年）先东后西，再北又南，改土城为砖城，增建外城，并把四门城楼改修为重楼，又于城角增建望楼四座，还在城四周各增建台铺十九处，至此城池始告完备。运城周围长九里十三步，合计一千七百丈；高二丈，池深七尺。四门命名：东叫“放晓”西叫“留晖”，南叫“聚宝”，北叫“迎渠”。又于城内修建钟、鼓二楼，为城堡式，下有四洞，通四方；上有女墙，中央建楼，系重檐攒山顶，置钟鼓于其内。午、子时两次撞钟，声闻十余里。鼓楼在东街路南，其遗址犹存，钟楼则荡然无存，其遗址在市东风百货商场之东南处，即东南西北四街之交叉点。运城西门外至西关为各路盐商云集之地，商店林

立，房舍栉比；运盐车辆，络绎不绝；行商货贩，车水马龙。山陕会馆，秦豫客商，皆常川驻此，确为财富贸易集散之重镇。

年代久远，物换星移，风雨侵渍，砖石剥蚀，又于天启二年，崇正七年、十三年再席重修运城。至清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姜镶兵乱，城之重楼台铺悉毁，遂于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御使李时谦和运使张鹏翮再恢复修葺。尔后虽历有修补，但改变不大，故不述及。

抗日战争期间，日寇焚毁西关；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挖洞防守，毁及城垣，拆毁钟楼。运城1948年12月28日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百废俱兴，商民欢庆，人口倍增，工商崛起，楼房高耸，马路宽阔。继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县为市，面貌焕然，城区扩展。现在之南环城路，河东路西段及河东市场，即旧运城城墙遗址也。抚今思昔，真有沧桑之感。一小小荒僻之路村，竟成为工农商百业兴盛之城市。

运城学生运动简述

李人序整理

河东乃英才辈出、人文蔚起之地。风后兴起于海隅，虞舜定居于鸣条，夏禹奠都于安邑，关羽诞生于解梁，关龙逢、段干木、范蠡、杜康、关汉卿在我市皆有遗迹可考。数千年间，仁人义士，前仆后继，革故维新继往开来。迨至近代，戊戌变法，学堂先设，辛亥革命，河东首义，五四运动，急起响应。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我市教育迅猛发展，学生运动风暴雨涌，惜其事迹淹没，史志不传；街谈巷议，语焉不详，间有人钩沈稽考，探微索隐，实未能尽其万一。兹仅就散佚之文献，采仿之人事，辑录编缀，分条叙述，供参加或目睹其事者之纠谬；供后人或后学者之参考。

早在1919年作为运城学生代表赴北京参加学生运动的徐亚桑（徐梓）就在运城第二师范进行革命活动，提倡新道德、新文化，宣传科学和民主，批判封建主义思想，传播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因此，运城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举行了“公理战胜强权”的提灯游行会。

1920年，我市东杜村的姚铎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山西省第一批团员中的一名。由于当时二师、二中学生有许多人在北京、太原等地，与母

校师生书信往来,邮寄书报,故运城学生对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极为敏感,接受新事物迅速,要求改革旧学制,反对腐朽校规,争取民主自由之风甚盛。各校因闹学潮就先后赶走过十二任校长,仅1927年至1937年被赶走的就有杨道南、李敏、李仙洲、史海沧、冯大猷、陈鼎山、刘雪庵、卫殿一、解子丰、尚光霖、史修容、刘子洲等人,轰而未走有张国瑞、杨汝良等人。民谚有“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干入师范,要学好入附小,要用功入明中”等语。运城师范的闹学潮在全国也是有名的,号为“华北三二师”之一。即保定的河北第二师范,曲阜的山东第二师范,运城的山西第二师范。这三所学校是当时各该省最革命的学校,也是建党最早的地方,进步师生多,革命活动多。我市较早的党支部就是1926年夏在二师建立的,第一任支书是卫文兴,第二任支书是阎子详,第三任支书是杜发理,1933年底改组为运城党支部,书记是李延河,都是二师学生。1937年春才改为运城市委,党支部由运城迁到校外去。

1925年在运城二师建立学生读书会,共产党员徐业桑向二师同学推荐进步书刊,介绍他们订购《独秀文存》、《新青年》、《中国青年》、《响导》及上海民国日报附刊《觉悟》等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阅读后激发了革命思想。这年由卫文兴、段嘉绂、李荣、孙云生(雨亭)等组织了“读书会”起到联系进步同学,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

反房捐税斗争——当年春季,阎锡山制定了值百抽八(按房价百分之八抽税)的房捐税。运城学生会响应太原各

界的反房捐斗争，发表了支持斗争的宣言，并让学生返乡宣传，迫使阎锡山停止了盘剥群众的房捐税。

泸案后援会的捐款——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二师学生即联络运城各学校组织游行示威，宣传讲演，并成立了“泸案后援会”支助上海罢工。动员各校学生回原籍劝捐，仅猗氏县旅运同学就征集捐款800元。

河东中学的建立——嘉康杰同志在这年学生暑假期间创办了运城“河东中学”，地址在南大街玄母庙巷，由张国瑞任校长。同时，嘉又把他在夏县堆云洞创办的“平民中学”（景梅九任校长）迁来运城。实际上两校工作都由他主持。次年康杰被捕该校被查封。

运城建党工作开始——这年下半年，中共山西党委派王鸿钧、崔锄人到运城发展党组织。首先把二师、二中进步学生组成“河东旅运青年社”，以研究社会科学为名，吸收党员。这次发展的党员有乔子甲、王月春、冯天祥、祁金兰、李德培等人。

1926年春，中共运城党支部建立——中共山西省委二次再派王鸿钧、崔锄人到运城发展党组织，并给上次吸收的党员发给党证。他两多次和二师“读书会”的骨干接触，宣传党的任务、性质和纪律，明确提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了卫文兴、段嘉绥、孙云生、等人入党。在二师建立了中共运城支部，支部负责人是卫文兴。

中国国民党运城临时市党部成立——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省委指示通过国民党进行工作，允许党员参加国

民党。当时组织的“中国国民党运城临时市党部”领导成员是卫文兴、段嘉祜、祁金兰、王月春、李培德、孙云生。卫文兴是主要负责人。通过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发展壮大党组织，并配合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开展反帝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土豪劣绅的斗争，学生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二师学生周卜风、邢亚雄、胡三余等在学校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临时市党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河东青年社的建立——为了更好地联系进步青年，开展学生运动，二师的“读书会”改名为“河东青年社”，并把“河东旅运青年社”的活动扩大到运城各学校。由于进步力量的壮大，学校还给该社一座教室，作为阅览室，《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公开摆出，让更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主义宣传。

轰赶反动校长杨道南——运城二中轰赶校长杨道南是该校共产党员发动和组织的，由学生丁宗显（解县）、钱守章（猗氏）、徐润生（荣河）等人领导，乔子甲（共产党员）草拟了告同学书；徐润生和赵敬思向同学讲演，揭露杨道南压榨学生的罪行。许多教员支持这次学潮，语文教师把乔子甲的文章详批细改，张贴到学生成绩栏，大家赞为革命的檄文。师生团结一致，学潮胜利了。

1927年是运城学生运动发展到高潮的一年，同时也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工农运动的转变时期。

党组织的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在运城二师、二中

又发展了郭溪（吴家祥）、解俊义、车范轩、聂鑫元、聂鑫元、刘福仙、任力田、曹守明、常天义、栗云章、邵事业等一批党员；青年团也发展了梁陶然（梁宗尧、夏县人）等一批团员。党团力量得到了充实和扩大。

轰赶反动校长史海沧——党在二师积极开展工作，引起了校方注意，在学生中制造纠纷和误会，谩骂进步同学是“过激党”、“俄国货”、“赚卢布的”。因此于四、五月间，在党的领导下，通过“青年社”发动同学，赶走了反动校长史海沧。

创建中山中学——嘉康杰同志于五月间出狱后，以安英俊的名义筹办中山中学，七月间在运城西大街八十八号的大院内招生开学。该校是党的机密机关所在地，于1932年被反动当局查封，嘉再次被捕。

私立明日、菁华中学相继成立——河东各县学生要求入学的人数增多，省立二师中不能满足需要。当时各界热心教育人士设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由二中教务主任张自安筹办了“明日中学”，由陈仰华任校长；二师语文教师陈贵和筹办了“菁华中学”，由崔斗辰代理校长。两校逐年扩大招生，为河东地区培养了许多中学生。

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由于二师、二中、中山等校相继建立了党组织，学生运动有了新的发展，走出学校到工农中去宣传共产主义，开展革命斗争。

盐池的建党和罢工——二师党支部向盐池派出四个工作组，以干短工为名，和工人一起生活劳动，揭露资本家的剥削罪行。后来发展了盐工张海娃、李清忠、张克孝等四人

入党，于阴历七月间在夏县庙前开会，建立了盐池党支部。曹守明（二师学生）在池南搞工运时被捕杀害。发动工人反对阎锡山增加盐税，又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失败后继续斗争，直到1929年初增加工资的斗争才取得胜利。

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二中学生王月春（党员）等人在省委特派员郭巨才、河东特委冯彦俊的领导下，联络从太原返乡度暑假的同学，在猗氏县开展反对劣绅刘廷训、资本家王万年侵吞“五卅后援会”捐赠的援沪款八百元，破坏反日运动的斗争。把刘、王十大罪状公布于众，并于八月一日集合群众万余人，冲开城门，在文庙召开空诉大会，郭巨才、冯大祥等人讲话。反动当局指使军警开枪镇压，造成流血惨案。为此，运城各校学生罢课声援，迫使阎锡山和河东道尹崔廷献下令，撤销王万年猗氏县财政局长职务，责令刘廷训尔后不准干预县政，并处罚刘廷训一千元，王万年一万元罚款，以抚恤死难群众缓解民愤。

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当年七月间，安邑旅运学生在冯天祥、邓国栋、王鸿钧、刘开化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驱逐安邑县长郑裕孚的斗争，联络点设在二师学生郭溪（共产党员）家里。一天正值安邑古会，学生就在桥头开会声讨，有万余群众参加，在会上历数郑裕孚欺压百姓，草菅人命，贪污公款，无恶不作的各种罪行。会后群众队伍向县衙门寻找郑裕孚，队伍塞满了安邑北大街，从上午到天黑谈判未取得结果。群众喊声震天，吓得郑裕孚交出现洋四千元和部分金银财物，群众仍不肯罢休。至到半夜，郑裕孚悄悄化装偷跑了。

冯大轰镇压学生运动——冯大轰原是二师博物教员，假装进步，由我党党员组成的国民党运城市党部吸收为党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原形毕露，被省党部右派委任为河东十三县清党委员。他与反动当局狼狈为奸，在六月间派军警包围了运城市党部，抓捕郭巨才，引起学生与军警搏斗，郭巨才在学生掩护下逃到夏县。紧接着冯以“跨党分子”名义开除了许多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籍。郭巨才立即指示政治面貌公开的党员转移到农村去。八月间孙云生和卫文兴到运城二师揭露冯大轰的右派反动面目，冯即暗示二师学生张相贤（国民党右派）偕同军警在晚间抓捕卫文兴，孙云生由嘉康杰掩护送出运城。这时冯以二师校长名义来到学校，并提牌通告把卫文兴、孙云生开除学籍。这年暑假后，阎子祥考入二师，他对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极为不满，决心要为革命奋斗。后来和同学范西蠡（共产党员）联系，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

夏县堆云洞会议——1928年春，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运城处于白色恐怖。这时支书卫文兴已被捕，中共运城支部遭到破坏。党员只能和自己周围的进步同学交谈一些政局与形势。后来通过联系在夏县堆云洞召开了一次河东各县党代会，只有十多个人参加，代表全区十七个县。听取了书记冯俊彦、副书记范希蠡传达广州起义后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阎子祥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交给他的任务是：在运城师范组织发动在校学生反对国民党统治，开展驱逐反动校长冯大轰的斗争。

驱逐冯大轰斗争失败——1929年春夏之交，阎子祥

在二师发动同学组织了“驱冯委员会”，有景南昌、芦进普、张克功、周树炳等十四人参加，散宣言，发通电，向全省各学校通告并向教育厅呈报，揭露冯大轰克扣学生津贴，残害青年学生的罪行。准备在一天晚上驱冯，但冯事先逃跑，便把训育主任王平正赶走，学潮连续了三天。这次斗争由于参加人员复杂，领导核心没有形成，再加上冯在校外钻营奔走，分化学生，又凭借军警武装返回学校，即将阎子祥等十三个同学开除，并诬为捣乱，令各县通缉，使斗争失败。

向囤积居奇，坑害灾民的资本家斗争——当年即历史上有名的民国十八年河东大旱灾，官绅勾结，盘剥灾民，民不聊生。中共山西党组织派王铭和运城二师党组织联系，发动学生到社会上宣传揭露官绅勾结利用赈灾款残害盘剥灾民的罪恶。兴业钱局经理薛士选、张麟芝和盐池场长关炳祥组成财团贩运粮食，囤积居奇，高价倒卖，甚至贩人口。学生即将这些罪行编传单，画漫画，张贴散发，轰动运城，流传太原，惹起全省公愤。阎锡山为了缓和民情，只好将其人撤职，车辆没收，粮食赈济，以平民怨。

1930年初，是河东党最困难的时期，嘉康杰被反动政府通缉，被迫离开中山中学，学校领导权被赵彩臣篡夺。赵系汪精卫的改组派，他用告密和分化的毒辣手段，驱走师生中的党员和进步学生。嘉果断地停止与中山中学的联系，把党的机关迁到夏县东山韩家岭，以保护该校支部秘密存在。

运城中小学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建立——该组织系群众性

抗日团体，由运城十三座中、小学学生会代表组成，总会设在运师。“九·一八”事变后，党组织通过运师训育主任张衡宇、学生李哲人等联系各校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工作而建立。要求各校在节、假日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并组织抗日义勇军接受军事训练和抵制日货等活动。该会下设宣传、组织和庶务三个股，都由各校学生担任，共有七个执行委员。学联第一任主席孙克和，第二任主席李哲人，第三人主席景秦珍。直到1935年初，景秦珍被捕后，才停止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太原学生游行示威，穆光政被军警开枪打死。消息传到运城后，运城学联发动组织各校学生在二师操场举行追悼会，会后游行示威。反动当局怕学生闹事，派军队镇压，分两路排到游行队两侧和学生并排前进。学生即高呼“反对长官打骂士兵！”“反对长官克扣军饷！”士兵和学生取得了一致感情，同情学生游行。

学生营救进步教师马云程——每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二师都要举行校庆纪念。这年马云程老师在大会讲话，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但有人说马老师是共产党，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安邑县政府就逮捕了他，关押在监狱。后因运城各校学生为马老师抱不平，舆论沸腾，才得到释放回校。马云程是陕西米脂人，北平大学毕业，系李大钊学生，在二师任国文教师，抛弃官方课本，选印进步文学，语言流畅，感情充沛，结合实际，鼓动性强，对同学感染力极大。据杜发理听阎子祥说，马是党派到运城教书的。任俭青也说，自己投入革命阵营，参加共产党，是和马老师的启发诱导很有关系。张文政说，马老师后来被国民党军官关麟征枪毙在北平。可他在运

城没有和党发生关系。

“丽丽派报社”的成立——这年冬季，菁华中学的陶君贻（裴丽生当时的化名）、崔斗臣、韩玉琦、余经梁等人，发动师生集股，创办了“丽丽销费合作社”，经销文具及平、津、沪的报刊和“生活周刊”等。1934年改名为“丽丽派报社”，经销《马克思传》、《列宁传》、《社会主义讲话》、《大众哲学》、《通俗辩证法讲话》等进步书籍。在当时晋南一带唯一的新书报刊社，很受读者欢迎，更是青年学生在假日、课余的游览地。他对宣传马列主义和进步思想起到很大作用。

青年互学会的成立——1932年3月间运师学生杜发理、孙克和、张步云、秦穆伯、姚晋太、薛发生、李治安、李哲人、孙光祖等人发起组成了《青年互学会》。从会员中征集新书，交流互读，并从北京、上海邮购进步书刊，特别是廉价翻版七折八扣的进步刊物。购回后，除留一部分借阅外，还原价分销给同学。有时辗转托人秘密收集到党内报刊《北方红旗》、《东方红旗》、《理论与实践》等，都分给进步同学传阅，借以传播革命思想。当时担任邮购传递任务的是张高升同学，为了不惹注意和麻烦，曾化名为张鹏程、张翼鹏、张时造、张普育、张勛等名子。该组织延续到1933年反动军警搜捕学生时转入隐伏状态，把会员名册及进步书刊在校方监视下于澡塘锅炉内烧毁。

党组织的发展、恢复和重建——1932年初，阎子祥以山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到运城进行恢复建党工作。在运师首批发展的党员有杜发理、李艳河、杨春荣、李明义、武士

俊、姚晋太、雷生荣、孙耀宗等。支部书记先是杜发理，后是李艳河。在教师中有马云程、李尧夫、张衡宇都是地下党员，但和学校支部没有组织联系。当时为了保护进步学生，让他们轻装前进，减轻顾虑，冲锋陷阵，对一批完全合格、可以信赖的同学没有履行组织手续，是没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秦穆伯、郑思远、梁陶然等人。他们品学兼优，反动当局也极力拉拢这些人。利用这个关系可以深入敌人内部了解情况。另外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左联”、“教联”等群众组织。

终于轰走了反动校长冯大轰——阎子祥把二师的进步学生团结起来，形成驱冯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人物有荆耀东、杜发理、秦穆伯（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很有影响）武士俊、姚晋太、孙光祖等。冯大轰虽有经济问题又压制学生，但他也分化、收买、迷惑了一部分学生，所以学生也分成两派，互相斗争。驱逐派占绝对优势，有杜发理、李振唐、孙克和、许胜喜等；保护派只有李治安、李明义等少数人。后来形成两派武斗，保护派占领打铃楼，驱逐派占领打铃楼四周的屋顶，相互用砖瓦打击对方。保护派因孤立无援，李治安眼看招架不住，只好跪下投降，武斗才告结束。驱逐派胜利后，再次发动群众，团结师生，坚持护校，终于轰走了反动校长冯大轰。

吓跑了校长陈鼎三——反动当局看到二师接二连三闹学潮，说是“学风不正”，是一种“邪气”作怪。要用“正气”压“邪气”，便派了封建卫道者陈鼎三出任校长，他满口诗云子曰，提倡四书五经，讲究仁义礼智，孔子长孟子